

林 舟著

◎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



生命的摆渡



海天出版社

生命的摆渡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

林 舟 著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丹娜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陈 炯

书 名 生命的摆渡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

著(编)者 林 舟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中国深圳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 刷 者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1998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5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I S B N 7-80615-762-X/G·203

定 价 13.80元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林舟（陈霖）很勤勉，近几年来，无论世事怎样牵缠，压力多么沉重，他总是能够用心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其中之艰难困苦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

记得1992年硕士生入学时，在研究生与导师互选中，我相中了林舟。其缘由一半是凭直觉，一半是通过他的履历而定的。就面相来说，他老实沉稳，精干大度；就经历而言，他从事中学教育多年，成熟而机敏。几年的相处，也确实证实了以上的看法。

在读期间，林舟很快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状态之中。我始终认为，有的人搞了一辈子学术研究，其实至死亦未进入真正的学术状态，有的人只要一上手就很快切入了学术领域的内核之中。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恐怕就在于研究者的悟性的高下之分。无疑，林舟的悟性力相当强，加之他的理性逻辑思维亦很出色，这就使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抢占了学术前沿的有利形势，流畅地书写属于他自身的学术话语。

在完成了多篇作家作品与创作现象的论文写作之后，林舟为自己的学术路数设定了一个“战地记者”的角色和位置，也就是说，他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介入文坛——通过与作家的直接沟通，撞击出情感和思维的火花，从而告白文坛当今小说写作和小说接受之间可能形成的差异，和这差异凸显出的艺术张力及其所带来的丰富意味。

起初，林舟与我谈及他的想法时，尚未形成一种十分明确的理念。大约是开篇之作受到了一致好评，大约是作家朱苏进的灵

动启迪了他思维的闸门，于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便展现在他的眼前——将新时期的青年作家都“过滤”一遍，用访谈的方式打开一个艺术的心理世界，它包括作家和代表接受者的两极内心世界。我不知道林舟的这种想法是否受了《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那样的书籍影响，总之，这种形式在中国文坛是新鲜的，这并非是说中国文坛没有作家访谈录的存在，问题就在于，当接受者作为一种公众代表的形象出现在作家面前时，大多是以“新闻采访者”的面目流动在作家创作和生活的表层结构上。而林舟则俨然是以一个艺术的探寻者的面目与作家进行魂灵的对白，进行艺术的对攻。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作家才能遇到知己，才能遇到对手，才能各自找到共同的宣泄口，从而才能演示情感碰撞和灵魂搏杀的精彩场景。

从《精神的自由与美永存——与朱苏进一席谈》开始，林舟陆续在《文学世界》、《作家》、《东海》、《百花洲》、《花城》等刊物上发表作家访谈录，其中，最主要的是1995~1997年在《花城》开辟的“访谈录”专栏。就这些形式的“论文”来说，我以为他在与作家的“对话”当中，尽量扮演的是一名不温不火的艺术心理研究者和调查者的形象。譬如在《王安忆——更行更远更深》中，他与齐红对王安忆作品的解读过程，以及王安忆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所形成的局部反差和落差，就开始显示了两极碰撞的意义所在，它将理论界对“三恋”和《岗上的世纪》普泛的定论与王安忆自身的辩解和盘托出，这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对文本的解读，从而达到深化作品的目的。现代型的阅读告诉我们，作品一旦问世，它就由文本、作家、读者三者构成了对作品进行解读的强有力的艺术对峙，在精彩的艺术对峙中，缺少了任何一方，那都将是一种艺术的遗憾。那么作为一名扮演“读者”的人物，他既要有独特灵性的个性化特征，同时也要兼顾到“大众接受者”的形象和心灵世界。因而，在如何处理好雅和俗的关

系上，访谈者必须掌握一个度，这个度一旦失控，就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曲高和寡”，要么“庸常媚俗”。就我所阅读到的访谈录来看，林舟较好地控制了这个度，这与他朴素地进入谈话和展开谈话的方式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林舟的访谈显然是偏向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有可能失去一些读者，但它们无疑是留下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界的一件幸事。

“访谈录”照样可以写成一种精彩的文体，它像论文，亦更似随笔散文，你可同样领略到那“史记”的笔法和“离骚”之风韵。一篇《史铁生——爱的冥思与梦想》，使你堕入感性与理性的双重空间之中，独有一种云谲波诡的艺术享受。不要说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对人生的参悟是何等的和谐，不要说两者对艺术形式的探讨是那样的契合，就缀于谈话之前的那近千字的“题记”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它把访者的心境以及史铁生作品的意境和当下的生活处境的细节，与自然环境紧密相扣，准确而间接地传达了史铁生作品的人文内涵：“它们化解了现实的苦难，传达着绵绵不绝的冥思与梦想，好像缓缓上升的云梯，引我们去看那灵魂的优美歌舞，它凝重而热烈，空灵而直抵人心，它以此追寻着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些看似“饰物”的小品，为整个访谈录平添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和特有的阅读环境。当然，对待不同的作家，访者表现出不同的访谈心境，因而所营造的访谈氛围也是殊异的，像《莫言——心灵的游历与归途》就更有语言的冲击力和心灵的张力，像《刁斗——反抗无奈》就更具有文化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洞察力。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林舟对这种体裁写作的驾轻就熟，乃至形成了自身的一种写作风格。

大约是从1994年起，林舟开始关注“晚生代”小说的创作，除了对陈染、林白的女性经验的写作关注外，他更致力于江苏的一批新锐作家的阅读和评论，如韩东、朱文、鲁羊、吴晨骏等，

并与这些作家结下了友谊。我始终认为，作为一种创作现象的出现，“晚生代”应纳入学人的学术视野之内，尽管我对“晚生代”的创作内涵抱有自己的看法，且对他们的文本进行了某些批评，甚至有些过激，但我始终把它作为一种学术和学理的批评范畴内的事情。因此，尽管林舟的观点与我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他与我在学术和学理层面的平等讨论。我历来不以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反而鼓励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鉴于此，林舟近年来对“晚生代”作家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我是抱着欣喜的目光而视之的。也许，哪一天我还将写文章反驳他的观点（他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我的观点），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我们之间那种挣不断的情谊。我常想，无论是写作，抑或是搞理论批评，都应该有一个学术气度，“费厄泼赖”是应该执行的。

林舟的这本访谈录的出版，是我在1998年最为欣慰的一件大事。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我祝福他在新的起点上能够再次腾起，冲击新的学术巅峰。

是为序。

丁 帆

1998年1月7日于紫金山下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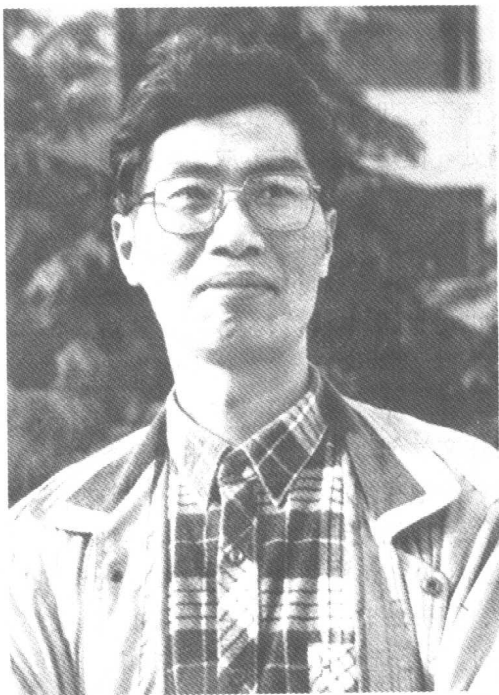


1	朱苏进——精神的自由与美永存
	附：英雄的碎片——关于《碎太平》的对话
19	王安忆——更行更远更深
33	鲁 羊——疼痛/温柔/怀疑
49	韩 东——清醒的文学梦
64	格 非——智慧与警觉
75	苏 童——永远的寻找
90	陈 染——女性经验的书写与超越
102	张 旻——欲望在舒展中消解
116	朱 文——在期待之中期待
130	林 白——守望与飞翔
143	北 村——书写苦难与意义探寻
154	余 华——叙事，掘进自我的存在
167	史铁生——爱的冥思与梦想
183	叶兆言——写作，生命的摆渡
197	莫 言——心灵的游历与归途
213	刘 恒——人生的逼视与抚摸
228	邱华栋——穿越都市
241	刁 斗——反抗无奈
252	阎连科——军中游子的魂梦
263	徐 坤——在颠覆和嬉戏之中
274	吴晨骏——在逃离中拒绝
291	后记

朱苏进

——精神的自由与美永存

1953 年出生于军人家庭。小学五年级时生病住院。1969 年入伍，1971 年开始在军内发表作品。现为南京军区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有小说集《射天狼》、《祭奠星座》、《接近于无限透明》等，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等，另有《朱苏进文集》。



1993年10月25日上午，我拜见了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朱苏进。在军区大院里朱苏进的家中，我与他畅谈近两小时，他那鞭辟入里而又轻松活泼，从容不迫而又干脆利落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谈话是从朱向前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第九期上的那篇长文开始的。

林：朱向前将你与莫言和周涛并称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朱：向前是我的好朋友，我和我的妻子的结合就是经他介绍而成的。他在那篇文章写好发表之前，就写信嘱我注意看一下。我读了，我得承认，文章写得很精彩、很潇洒，有些地方触及了痛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大前提有问题：一、我们三个都是军队作家，但并不都是写军队生活的，采用的文体也不都是小说，拉到一起作平行比较，显得勉强，似乎是为了应立论之急需而将有关三个人的评论纳入一个空架子中；二、“三剑客”的提法恐怕也是为了“立言”，实际上“剑客”一词用到我们头上并不妥，因为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让人联想起一类美学风格和审美追求。

林：那么你说的“触及了痛处”是否包括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对你文学创作起了巨大作用的三个方面，即“将军情结”、少年罹病和炮兵生涯？你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或契机是什么？

朱：他提到的后两个方面确实是的。少年时的那场病中，我见到了许多可怕景象，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时为了排遣心中恐惧，我拼命地读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读，有文学的也有非文学的。《毛选》我也读得津津有味，读的不是正文，是注释；正文看不懂，注释中却有很丰富很有趣的东西。在《接近无限透明》这篇小说中我写到了那段经历，那段经历不仅产生了这篇小说，而且影响了我整个的创作，因为它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隐痛。最好的痛是隐痛，它耿耿于怀又难以言说或不能言说，

也许就是这成为创作的最深层最隐秘的内驱力吧。炮兵生涯在我创作中的影响显而易见，自不必说；我的所有小说几乎都与炮兵有关。至于“将军情结”，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向前有些想当然。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我最初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医生。我十六岁到部队也是想当个卫生兵。那样既符合我当医生的愿望，又能留在连部。但那时要锻炼，而那时的“锻炼”就是要到最基层去当一名炮兵。我只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在部队里学习了更多的文化知识，我就动手写写画画，想当个文书干事什么的。因为那样就不必像其他战士那样站岗、执行野外的艰巨任务了，更重要的是那样就能获得一种独立自由的感觉。在所有兵种中，炮兵是最重视协同性的兵种，步兵一人一杆枪就是一个战斗力，炮兵必须七个人协同完成一整套动作才能形成一个有效行动，七个人只是一个战斗力，一个人只是这一个战斗力的七分之一，他完全不属于自己，他不能有自我意识。那么要是能靠一枝笔一张纸从这样的处境中独立出来，有充分的理由享有难得的自由和仅属于自己的空间的话，该有多好。这多么具有诱惑力呀。

林：于是你便开始小说创作了？

朱：不。我写了一年的新闻稿，但一篇都没被采用。我在沮丧和绝望中研读了人家发表的新闻，惊讶地发现它们能发表全在于它们是编造出来的，是假而又假的东西。我一气之下决定与其写不真实的新闻，还不如写小说，小说不就是要编造、虚构吗？于是我就写起小说来。

林：原来是这样！有意思。你刚才说炮兵生涯对你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我看不仅限于取材方面，应该包括这段走上写作道路前后的经历和体验吧。还有，你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也一定得益于炮兵生涯。

朱：哦，那当然，但不是靠眼睛。你的视力多少？0.5，那可比我幸运多了。我参军的时候眼睛就是0.2（生病时看看

的)，距离十米看人面孔模糊，距离三十米男女辨别不清，而让我干的偏偏是瞄准兵，后来又干侦察班长。那些仪表、机械都是为1.5眼睛配制的。眼睛不行，我的精神压力固然很大，但我拼命调用了其他感官的敏锐性以补不足，调用了大脑的记忆、想象和快速反应，硬是对付过来，居然一次差失也没有出现过？

林：这也可真称得上是奇迹了，也许这种观察和感知的独特性构成了你小说才能的独特方面。你作品中的人物很多都是年轻的军官，不是军官也一定有当军官的老子，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你自己愿望的投射，或许是一种无意识的投射。“以意进志”，说你有一种“将军情结”恐也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吧。这我们且不去深究，但是作为一种对比，你的作品中根本就没有刘震云《新兵连》中那些最底层士兵的形象，你注意到了吧，你是怎么看的呢？

朱：是的，这除了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军队中外，主要是因为我与刘震云切入生活的基本角度不同。他是还原现实，而我试图浓缩现实、超越现实，带着理想色彩。而且我更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看待军人生活中的物与事；没有当过军人的人也许难以理解，军人特有的审美的眼光凝聚在诸如战斗模型、衣纽扣、武器装备上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件之类东西上。

林：你这么一说令我想起《射天狼》中对罗怀牧临走前移交那堆东西给袁翰时的情景的描述，还有《孤独的炮手》中白方对大炮的那种痴迷情感。我们军外之人虽不能完全理解，但置身于作品之中似乎还是能感受和体验到那份情感，尤其是当这些与对军人的人格和情怀的表现浑然一体的时候。

朱：军人的情怀是我关注的焦点。我总感到，在我们国家，有庞大的军队，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普遍缺乏一种对事业的全身心的投入和执着。这倒不是说非得有将军梦不成其为军人，非得有战争不足以显示军人本色，我只是想借助这些来表现

一种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其支柱的和平年代军人形象。这固然带有很浓厚的理想色彩，在这种军人形象中，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推出了一种超越是非得失，功过善恶的审美境界。这在《战争自尊者》中有突出表现，而《炮群》这部长篇可以说是我这种青春梦的一次总的宣泄。

林：这在孟中天、西丹石和白方等人物身上也很突出地显现出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种理想色彩不是硬贴上去的，而是在痛苦的搏斗中在人生的夹缝里升腾起来的。而且我感到你在对这种审美境界的追求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军人情怀本身，而进入到对大写的人的思索、对人类命运的深度感悟。像《轻轻地说》就展示了军人情怀同人类永恒之爱的相通，《绝望中诞生》题目本身就暗示着人的一种普泛的处境。向上的理想的飞升与向下的人性深层的开掘，似乎构成支撑你的文学世界的两极，它们在军人生活的土壤上相接相通，使军人生活成为人类生活的特定情境的象征。

朱：对人性的思考可以说是我自觉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可能是愈来愈强烈的。我的取材始终限于军营军人。惟有向纵深处的掘进才能获得更本质意义上的开阔。在人的根本问题上，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不存在。《绝望中诞生》里“孟氏构想”确实是个奇迹，但这奇迹又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孟中天的悲哀，因为这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宦途中受挫、人的自主意识被极度贬损和压抑后“移情他场”扭曲所致，我让他最后在宋雨的召唤下毅然抛弃惊世骇俗声名大振的“孟氏构想”，坚决返回他原来所属且游刃有余的生存中，表现出他的执着情怀的难以泯灭。一个人的才华本应施展于政治的疆场，却浪费于别的领域，尽管仍有成就，但这成就所达到的程度恰恰标志着他被扭曲的程度。这好比一棵很好的风景树，当人取下它的胳膊大腿，用以打制成家具，这家具可以是很好的家具，但那是

以自然生长的风景树的毁灭为代价的。

林：顺便问一下，“孟氏构想”的理论是否属实？

朱：完全属实，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搞这个的。作品发表后，许多地科系的大学生、研究生都纷纷写信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确实已是诸多地球形成假说中的一种。至于人物的遭际及裹于其间的观念和激情则是我赋予的。

林：你刚才的那番话使我很受启发。那么，可不可以说“孟氏构想”的出现体现了孟中天独特的对环境抗争的方式和结果呢？尽管那是扭曲所致。

朱：是的，恶劣的环境对人的挤压随处可见，人在对环境的适应中作出抗争决非易事。对孟中天这样的人来说，环境的压力愈大，他产生的抗体愈强，这使他没有在那种扭曲中消蚀掉自己，而一等时机来到便能飞动那搁置已久的翅膀。有的人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完全地等于环境，环境之于他就像一件合身的衣服；有的人则小于环境，被环境吞没掉。人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抗争中体现出精神自由的品格的高下，实际上，人获得自由的程度往往在于他渴望自由所达到的程度和他为此作出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

林：你的近作《醉太平》中的夏谷、季墨阴也属于孟中天这类人物吧，但他们只有适应和抗争却没有那种冲决一切臻于自由环境的辉煌了。《醉太平》在《钟山》上还没有连载完，但可以从载出的部分推断，它定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触及神经和灵魂的作品。这“醉”字就很有意思。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它似乎应反训为“醒”，清醒地切入和深刻地反省当代军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世界。你能就《醉太平》谈谈吗？

朱：“醉”就是一种昏昏然又不失清醒的状态吧。《醉太平》的“醉”恐怕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好的“醉”吧。也就是微醺，七分清醒，三分醉意。这部小说写的是某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

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这种大院文化心态在中国不到处都是吗？一个大院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世界、小王国，其中许多人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人物或抽象的事物旋转着，转着转着，渐渐地在醉与醒之间失去了自我的存在。夏谷、季墨阳与孟中天确实有一致性，只是这里我以更多的写实性笔墨逼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种种扭曲。夏谷、季墨阳他们在与环境的适应和对抗中实现了自身的才华。这才华你不得不佩服，尽管你会为他们的迷失感到悲哀，对他们的行为从善恶是非角度加以指责。

林：刘亦冰的形象很突出，与你笔下的另外一些女性如韩小妮、白霖、军人的妻子、与警卫战士发生恋情的将军的女儿等等相比，更具独立价值。夏谷到刘达家去的经历，你从刘亦冰的角度重新叙述了一遍，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个人物的强调突出？你是否要通过对刘亦冰的塑造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有所突破呢？

朱：我不会写女性，写出的女性多是想当然，是我意念的强加，至于女性是不是那样，我不管。刘亦冰的出现与我在这个年龄上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有关，对同一故事从两个角度各叙述一次的写法，在你提到的这一部分是为了突出刘亦冰的形象，剖示她的内心世界。这写法本来准备采用得更多些，但由于那样会使篇幅拉得太长，也由于那样会使男女情感纠缠太多而冲淡对大院心态的表现，所以放弃了。

林：刘达、季墨阳、夏谷这样一个老中青人物序列的安排是不是出于获得一种历史深度透视的效果？

朱：我没这么想。这样一个序列是很自然的事，就像茶缸总有个缸盖一样的自然。像刘达这样的军中老人，可写的东西一定很多，但是我感到不好把握，这与我的生活范围有一定关系。

林：《醉太平》的语言似乎也有所变化，它没有了《绝望中诞生》、《孤独的炮手》等作品那种喷射状的激情式语流。

朱：我是力图以两套笔墨来表现生活中理想和现实这两个层面的，如向前分析的那样。在侧重于前一个层面时，语言多是收敛凝缩后的进发；《醉太平》侧重于后一个层面，语言多是在放松状态下的人物口语。实际上仔细想其中还是有所说的喷射的痕迹。这在还没载出的部分里可能更明显些。

林：你刚才提到“两套笔墨”、“两个层面”。我想在你的这种艺术追求中是否隐含着对人格分裂的平衡或弥合呢？

朱：一般人都有人格分裂。有的人在一种人格状态下活得很快乐，一转身在另一种人格状态下也很心安，他们小心地回避着分裂与矛盾，以至渐渐堕入麻木的境地。只有在两种或多种分裂人格的冲撞中才会产生美妙的一瞬，这美妙的一瞬即赋予人生的意义，因为在这一瞬中人生得到一种完整的呈示。这就如天空与大地在闪电雷鸣的一刹那合二为一，浑然一体了。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未必有这样的一瞬间的光照；在我的两套笔墨写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恐怕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瞬间。

林：这么说来，你是在小说创作中投射或寻找与发现人格分裂的痛苦中撞击出的美妙瞬间，这瞬间可谓是人生的审美至境和审美的人生至境的合一了。在《炮群》与《醉太平》这两部长篇写完后，你是否感觉到生活积累的缺乏？你已经写了这么多年，创作了这么多作品，在创作的间隙里你是不是总有意识地去接触基层的和外面的生活，获得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呢？

朱：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积累的缺乏，也从没有到生活里去收集素材和捕捉灵感。我觉得最重要的生活积累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具备了，以后是对这些积累的反复咀嚼和消化。写小说最关键的是想象力，而并不在于生活素材。素材俯拾即是，不必刻意寻求。正像陀斯妥耶夫斯基能从一份小报角上不满三百字的新闻衍生出一个长篇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想象力。

林：如果按照容格的“心理型”和“幻觉型”艺术家的分

类，你恐怕是介于两者之间。你提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令我由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联想到你笔下的孟中天这类气质的人，联想到你少年罹病的经历，这之间的联系是颇微妙的。你一定很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吧，除了他，我想知道你还喜欢读哪些外国作家作品。

朱：很多的。像海明威、福克纳、茨威格、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等，尼采和叔本华的文章我也喜欢读，尼采的语言风格令我佩服。还有萨特，萨特的文学作品虽然是他的哲学理念的内核融化开来演绎而成的，我还是很爱读。如果拿鲁迅与他比较的话，我觉得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更能让我接受，更让我感到亲切，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如萨特。

林：对当代文坛上的作家作品你关心吗？对当代评论家的评论你又是怎么看待的？

朱：一般来说，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拿来读读，最喜欢的是张承志的作品，他的小说从语言到精神我都很欣赏。还有王安忆的作品读来也觉得蛮好。评论家的评论可以当作一种文章来读，尤其是那些文笔好又能抓住要害点破为你忽视的东西的评论文章，让你在赏心悦目之间获得心智上的启发。比较起来，我读的更多的是评论家对其他作家的评论，至于对我自己作品的评论，我读得很少，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评论只是落在了我的影子上，当然那影子是我的影子，也是我的一部分吧。

林：在写完《醉太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你好像不是那种写得很快很多的作家，而且你从不写短篇，是不屑写短篇吗？

朱：《醉太平》写完后，我基本上处于一种“虚脱”状态，至于以后，我打算继续中篇和长篇创作，具体写什么没定，我从不写短篇，不会写短篇。我是在一下子蹦出好几个意念的时候有写作的冲动，一铺展开来就是三万字到七万字的中篇。我不大